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67 ·

歷史·地理類

生死關頭

劍峰編輯

七人之獄

沙千里著

救國無罪

時代文獻社編

上海書店

劍
峰編輯

生
死
關
頭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初版

抗戰文生 死關頭

(全書一冊)

實售國幣六角

外埠另加寄費一角

編輯者——劍鋒

出版者——漢口大時代書店

不准翻印

總經售漢口交通路四十號教育書店

分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西安九洲書局	雲南世界書局
各埠生活書店	廣州共和書局	成都北新書局
漢口光明書局	重慶大東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據大時代書店1938年版影印

抗戰到底——是生路——

方能獲得最後勝利！

中途妥協——是死路——

無異投降永難復興！

——編者——

蔣委員長宣告國人貫徹抗戰到底決心

——代 序——

此次抗戰開始，迄今我前線將士，傷亡總數，已達三十萬以上，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更不可以數計，犧牲之重，實為中國有史以來抵禦外侮之所罕觀。中正身為統帥，使國家人民，蒙此鉅大犧牲，責任所在，無可旁貸，中心痛苦，實十百倍于已死之將士與民衆。一息尚存，唯有捐糜頂踵，期以貫徹抗戰到底之主旨，求得國家民族最後之勝利，以報黨國，以慰同胞。敵人侵略中國，本有兩途：一曰鯨吞，一曰蠶食，今者逞其暴力，陷我南京，繼此必益張凶燄，遂行其整個征服中國之野心，對於中國為鯨吞，而非蠶食，已由事實證明，就中國本身論之，則所畏不在鯨吞，而在蠶食，誠以鯨吞之禍，顯而易見，蠶食之禍，緩而難察，敵苟持慢性之蠶食政策以亡我，浸潤侵蝕於不知不覺之間，則難保不存因循苟且之心，懈其敵愾同仇之義，馴至被其次第宰割而後已。今則大禍當前，不容反顧，故為抗戰全局，策最後之勝敗，今日形勢，毋寧謂于我為有利，且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我全國同胞，誠能曉然於敵人之鯨吞，無可倖免，父

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效法，步步設防，則四千萬方里國土以內，到處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壁壘，以制敵之死命，故我全國同胞，在今日形勢之下，不能徒顧慮一時之勝負，而當澈底認識抗戰到底之意義，與堅決抱定最後勝利之信心，茲為我同胞約舉其要義如下：

一，此次抗戰，為國民革命過程中必經之途徑，中國欲外求獨立，內求生存，解放全民族之束縛，完成新國家之建設，終不能不經此艱難奮鬥之一役，故對日抗戰，乃三民主義與強權暴力帝國主義之戰爭，亦即被侵略民族，對侵略者爭取獨立生存之戰爭，與通常國際間勢均力敵之國家，相互戰爭，大異其趣，故抗戰之始，非不知我之武器軍備，一切物質力量，遠不如人，而我之革命精神，終不當以此為之屈撓。稽之各國史例，凡革命建國之大業，本非旦夕所可期，所經之險阻愈多，則所獲之勝利亦愈大，惟賴我革命精神無所撓屈，再接再厲，愈挫愈奮，則障礙摧毀之日，即最後勝利之時。敵人此次侵略中國，其最大目的，固不僅欲佔我土地，屠我人民，滅我文化，而尤在消滅我三民主義，與革命之精神。使我革命精神一日不滅，即我國家民族亦一日不亡，且今日所遭之挫折，尙未達到艱危之極度，若遂自甘退屈，則精神一弛，國隨以亡，奴隸牛馬之辱，有十百于今日戰爭之痛苦而不止者。全國同胞，須知任何國家，欲解除壓迫，完成革命，決非少量代價所可希冀，此日多忍痛一分，將來成功亦多增一分，吾人為國家民

族與世世子孫計，犧牲雖鉅，無可避亦無可辭，所謂當澈底認識抗戰到底之意義者此也。

二，既明革命過程中之中國，當以抗戰到底爲本務，則目前形勢，無論如何轉變，唯有向前邁進，萬無中途屈服之理，蓋抗戰雖不能必勝，而屈服卽自促滅亡，固毋寧抗戰而敗，戰敗終有轉敗爲勝之時，滅亡永無復興之望，國家獨立之人格一墜，敵人宰割之方法愈酷，萬劫不復，卽永陷于沉淪。況戰爭成敗之關鍵，常繫于主動被動成分之多寡，此次抗戰，縣亘五月，敵方最初企圖，實欲不戰而屈我，我方所以待敵者，始終爲戰而不屈，不屈則敵之目的終不能達，敵愈深入，將愈陷於被動之地位，敵如必欲盡佔我四千萬方里之土地，宰制我四萬萬人民，所需兵力，當爲幾何，誠使我全國同胞不屈不撓，前仆後繼，隨時隨地，皆能發動堅強之抵抗力，敵之武力，終有窮時，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所謂當堅決抱定抗戰必勝之信心者此也。

三，日本侵略中國，實爲其侵略世界之開始，中國自抗戰之初，揭櫫二義，爲民族生存獨立而戰，同時卽爲國際和平正義而戰，數月以來，雖國際之裁制，尙未充分發揮，而公理之是非，固已大白于天下，吾人對於此種偉大使命，既已毅然承當，則不問國際形勢前途如何，必當盡其在我，初不必遽形失望，尤不可稍存依賴，但使世界正義不終枯竭，則吾人目的必有達到之一日，任重道遠，不容少懈，此尤全國同胞所宜深念者也，中正受命黨國，有進無退，當此存亡呼吸之際，願與吾同胞共勉之。

抗戰一文
生死關頭目次

一 總論

- 1. 毛澤東：論中日戰爭……………一
- 2. 潘漢年：如何確保抗戰的全部勝利……………九
- 3. 錢瑞俊：戰事勝利的基礎在政治……………一二
- 4. 錢瑞俊：目前的時局……………一六
- 5. 彭德懷：爭取持久抗戰勝利的幾個先決問題……………二三
- 6. 洛甫：論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持久性……………四二

二 國際外交

- 1. 張弼：全面抗戰發動後的國際形勢……………一
- 2. 伯韓：中國抗戰後的國際形勢……………八
- 3. 潘漢年：中蘇不侵犯條約的展望……………一二

4. 思 慕：孤立的日本的掙扎……………一五
5. 張 弼：從中日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二二
6. 張西曼：抗敵救國要厲行總理聯俄政策……………三〇

三 政治

1. 金則人：抗戰中的民主問題……………一
2. 張志讓：修正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一二
3. 大公報：全國更要切實團結……………一六
4. 施復亮：抗戰中的政治問題……………二〇
5. 毛仲雲：全面抗戰的爆發與全國總動員……………三四

四 經濟

1. 姜君辰：保證抗戰勝利的經濟條件……………一
2. 黎百強：戰時財政經濟問題……………七
3. 宗 漢：從經濟上觀察中國能否長期抗戰……………一六
4. 寇松如：中日戰爭與日本經濟……………二〇

5. 鄭森禹：從經濟資源上觀察日本作戰力量……………二七
6. 楊端六：法幣會不會變成馬克盧布呢……………三九

五 軍事

1. 劉列夫：我們的自衛戰術……………一
2. 劉 羣：民衆協戰……………五
3. 張君勱：嚴明戰時賞罰大權……………八
4. 金仲華：從假想的中日戰爭到真實的中日戰爭……………一二
5. 張佐華：怎樣實行徵兵……………二五
6. 余 一：間諜戰爭……………三一

六 文化教育

1. 楊東蓀：要從戰時教育中樹立起新文化的基礎……………一
2. 楊東蓀：戰時教育問題……………五
3. 大公報：關於宣傳工作的建議……………一三
4. 翦伯贊：怎樣動員我們戰時的文化……………一六

5. 沈志遠：抗戰中的思想問題……………二九

6. 季 平：抗戰教育的任務……………三七

7. 維 持：戰時的難民教育……………四一

七 民衆運動

1. 潘漢年：羣衆動員的基本問題……………一

2. 潘漢年：從漢奸之多談到鄉村工作……………四

3. 漢 夫：機關簡單化！工作羣衆化……………一四

4. 潘漢年：動員民衆保障抗戰的勝利……………一七

5. 沈志遠：澈底抗戰與領導民衆……………二一

八 重要文件

1. 中國共產黨宣言……………一

2. 蔣委員長談話……………四

3. 宋慶齡：國共統一運動感言……………五

4. 中國文化界告國際友人的沉痛宣言……………九

5. 宋慶齡：致英國工黨書……………一五

要從戰時教育中樹立起新文化的基礎

戰時教育有着兩個根本使命：第一是動員全國教育工作者，支持全民族的全面抗戰，爭取戰爭的最後勝利，獲得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第二是動員全國教育工作者，在全民族的全面抗戰過程中。隨時隨地，擔負起新啟蒙運動的任務。

關於第一點，本刊另外有篇文章專門討論它；這裏只討論第二點。

戰爭毀滅了文化，但同時也創造了文化，尤其是在民族解放戰爭中有着這種前途。日本帝國主義者獸性的發作，炮彈的轟炸，正不知毀滅了我們多少寶貴的文化。兇惡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不但要從軍事上來征服我們，並且要從政治經濟文化諸部門來征服我們。總括說一句：它要毀滅整個中華民族，使得我們永遠不能翻身。飛機大炮轟炸我們的老百姓，鴉片嗎啡白面毒化我們的同胞，這是它從種族方面毀滅我們的拿手好戲；「王道樂土」下的奴化教育，宗教的麻醉教育，對我國文化機關的轟炸，這是它從文化方面毀滅我們的拿手好戲。

我們面對着民族的生死關頭，全國教育工作者應該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堅決地完成上述兩個使命。

在戰時，爲着要使教育與全面抗戰配合起來，對教育機構與課程予以根本改革，同時把過去個人主義的訓練方法改變爲集體主義的訓練方法，把過去形式主義的教育改變爲自我教育，不用說，這是有着絕對的必要的。

但僅僅這樣，還嫌不夠。我們爲着要給敵人毀滅文化的毒惡行爲以回答，爲着要進一步地加強教育在全面抗戰過程中的力量，爲着要迎接行將來臨的偉大時代，至少我們還得從戰時教育中樹立起新文化的基礎。

從戰時教育中樹立起新文化的基礎，即是在民族解放戰爭中我們創造新文化的開始。這工作的第一步，便是新啟蒙運動。並且在現階段中，也只有把新啟蒙運動與民族解放戰爭密切地配合起來，民族解放戰爭才能在文化的領域上獲得強有力的支柱，同時，新啟蒙運動才能逐漸地展開起來。像這樣的認識，應該是教育工作者活動的主要目標。

教育工作者活動的園地，應該是文化的整個領域，在這裏我們必得打破過去局限於學校教育的狹義的形式主義，而把我們的活動展開到文化的各部門裏面去。只有這樣，教育工作者才能够擔負起新啟蒙運動的重大使命。

現階段新啟蒙運動的內容是什麼？

第一是提高並強調落後大衆的政治教育。教育工作者過去有了絕大的錯誤，即漠視了教育與政治的聯繫，教育工作者自身壓根兒就對政治沒有明確的認識，甚至於沒有與

趣去求得認識，更談不到要他們對被教育者作政治教育的工作。在目前，全面抗戰已經開始了，擺在眼前的重大問題，就是怎樣動員全國民衆一致組織起來支持這全面抗戰，爭取最後的勝利。但事實上所表現的，全國民衆不但沒有組織起來積極支持全面抗戰，甚至對這次抗戰的意義都沒有了解；抗戰的前途，在這裏便深深地隱伏着嚴重的危機。教育工作者站在自己的崗位上，應該一致起來克服這個危機：首先自己改變過去錯誤的態度，積極在工作中不斷地對自己作政治訓練；同時，提高並強調落後大衆的政治教育。在現階段中，我們需要的是全民族的統一的抗戰，因此，政治教育的主要課題就是民主運動。只有這樣，才能够動員全國民衆組織起來支持全面抗戰；也只有這樣，全面抗戰才有勝利的前途。

第二，是提高並強調落後大衆的科學教育。科學教育的主要任務：消極方面在掃除傳統的迷信與玄學的見解，積極方面在建立起理性的世界與科學知識的大衆化。前者的意義，是掃除抗戰的障礙；後者的意義，是替持久抗戰樹立一個新的基礎。在過去，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科學這東西成了少數智識分子的專有品，廣大的民衆始終不曾跨進科學之門，愚昧無知與『封神榜』型的思想布滿在民間。科學教育倘若仍舊依照過去的方式來進行，我相信科學教育還是不能完成上述的兩個主要任務。因此，我們要求從抗戰的實踐中，動員全國教育工作者，動員全國科學家，廣開科學之門，把研究室實驗室

裏面的工作，由學究式的變成爲通俗的，由少數智識分子的專有品變成爲大衆的糧食，同時，大衆由於當前抗戰的展開，正需要着這樣的糧食，則更是我們提高並強調落後大衆的科學教育的絕好時機。只有這樣，科學教育才能夠完成上述的兩個主要任務。

第三，推廣識字教育，厲行掃除文盲運動。掃除文盲運動的重要，是任何教育工作者所深切了解的，但主要的，就是要求全國教育工作者把要這運動趕緊地與抗戰的實踐配合起來，使得這一運動的展開更容易更順利。

上述這三點，是新啟蒙運動的主要內容。我們必得在抗戰這一總目標之下，展開新啟蒙運動。這就是新文化的基礎，有了這個基礎，新文化才有開花結實的一天。我們不應忘記了在這偉大的神聖民族解放戰爭中的重大任務，我們要從戰時教育中樹立起新文化的基礎。戰爭可以毀滅文化，但同時也創造了文化；全國教育工作者，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在抗戰的實踐中，一致奮起來完成這神聖的任務吧！

（楊東）

戰時教育問題

近來有些朋友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戰時教育和平常時期教育有無不同之點？」我們的答覆是『有。』

第一，從全國總動員一點來說，政治、經濟、軍事諸部門既然由平時狀態入於戰時狀態，集中一切力量於抗戰這一點，則教育這部門自不能單獨例外，並且教育不是獨立的東西，只有在它與政治、經濟諸部門取得密切聯繫時，才能够發揮其積極的作用；因此，當一切部門都在變動的時候，教育這部門也不能不跟着變動。

第二，從半殖民地國家反侵略國的戰爭來說，更顯示出知識分子在戰爭中地位的重要。現代學校教育制度，原係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把它移植到處在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國來，自然是『橘過淮爲枳，』發生了『鑿柄不相入』的現象。但從另一方面看，却不能否認中國最近幾十年來知識分子在屢次改革運動與革命運動中所起的積極的作用。目前是全民族的統一的抗戰時候，要取得抗戰的最後利，就必得發動全國民衆起來支持抗戰。而所謂全國民衆，主要的就是指着那人數最多而力量又最大的工農大衆而言。但是由於工農大衆文化水準的低落，要他們起來支持抗戰，固然主要的應該把改善工農生

活這問題聯在一塊；可是我們也不能忽視智識分子在目前有着組織並教育他們的任務。因此，教育在這時便起着特殊作用，而這作用在平常時期是向來被教育工作者所漠視的。

單就上述兩點來說，已經充分地表明出戰時教育與平常時期教育的不同之點。現在且讓我們來談。

戰時教育的方法問題

這第一是實施集體主義的訓練方法。掃除自私自利的觀念與行動，養成爲民族國家而犧牲的精神；嚴格執行自我批判，克服智識分子的動搖性與浪漫主義；實施嚴肅而有紀律的有戰鬥性的集體生活，在集體生活中體煉出組織的方法與工作的技術；提高政治教育，在政治教育中養成強有力的幹部；側重有組織的活動，在有組織的活動中養成民主的精神；廓清一切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與『我行我素』的感情衝動，提高現實主義與崇尚理智的精神；這一切，都不是過去個人主義的訓練方法所能做到的，只有集體主義的訓練方法才能够完成這些任務。我們堅決地認定：戰時教育只有緊緊地把握住集體主義的訓練方法，教育在抗戰中才能够充分地顯示其積極的作用。不但如此，同時，我們還誠懇地要求全國教育工作者澈底地了解並執行『教育者也應被教育』的原則，在教育

過程中要認定自己同時也是被教育者；只有這樣，教育工作者才能夠實現集體主義的訓練方法。

第二是集體主義的自我教育。過去形式主義的學校教育，真是漏洞百出：它把教育與現實生活打成兩橛，把學與用，知與行分離起來，教育活動變成了沒有靈魂的木乃伊。它在平時，既是空洞無物；到了戰時，由於浪費財力，物力與人力，它將成爲抗戰展開的障礙物。要補救這缺點，便只有拿集體主義的自我教育來代替它。集體主義的自我教育把教育與現實生活打成一片，把學與用，知與行聯繫起來，它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的教育；它的最高原則，就是在一切集體組織中，在一定的計劃之下，把一切活動，一切工作以及經常發生的事件，都認定是教育活動的主要內容，也即是教育活動自身。但這裏所謂一定的計劃，必然是通過某一正確的理論與認識而得到的結論，不然的話，便會犯着實用主義與經驗主義的錯誤。澈底地了解了這原則，教育工作者就會懂得那具備了教室，實驗室，研究室以及圖書館的教育活動固然是教育活動，但根據這原則而發生的一切活動，又何嘗不是教育活動呢？尤其是在戰時，我們更有理由認定後一種教育活動將成爲最有效而又最廣大的教育活動，將成爲支持抗戰的最有力的支柱；甚至前一種教育活動，在目前，也必得根據集體主義的自我教育的原則，才能夠發揮其最大效能。

上述兩個方法，其實只是一個。如果要改造中國教育，我們認定首先便應該從方法

上着手，而方法中最有力而又最有效的就只有集體主義的自我教育；這一改造，不能實現於平時，我們但願爲着增強抵抗力量起見，能够實現於戰時。方法問題談過了，現在且讓我們來談

戰時教育的實施問題

戰時教育的實施，有着兩個主要原則：第一是戰時教育的實施，即戰時教育的一切活動，都有一個總目標，這就是集中於抗戰這一點上，以爭取最後勝利；第二是戰時教育合理化的原則，即費最少的財力物力以收得最大的效果。

根據這兩個原則，我們對於現有學校的處理辦法是這樣的：第一是對於專門以上學校的處理，把不必要的即與抗戰無直接幫助的學校，一律停辦，而由政府擇定幾個地區，開辦幾所與目前抗戰有直接幫助的大學或研究院，例如醫科大學、理科大學、工科大學、抗日政治大學之類。在這一改革過程中，希望政府把那一向爲學閥所把持而視爲己私有物的專門學校與大學校予以徹底的改造，我們認定學術與文化是全民族的所有物，決不能讓少數學閥把持，一方面造成壟斷的局面，使得許多有學識的人不能展其所長，一方面造成派系的鬥爭，把整個教育界學術界鬧得一塌糊塗，其次，我們主張把不必要的學校停辦，不但合於抗戰的需要，並且合於眼前的事實：一則由於私人經濟的窮困

，能够負担鉅額學費的專門學校以上的學生一定大量的減少，因此，即令各大學各專門學校按照老模老樣辦下去，其結果恐怕是教授多於學生，而不免於浪費；一則由於民族解放戰爭的展開與持久，還拿着「教育爲百年大計」的理由，叫大批學生在學校裏過平常時期的生活，即令學生一向是綿羊，到這時恐怕也要變成了覺醒的獅子，教授們在教室裏只管講得眉飛色舞天花亂墜，學生們恐怕也不會安坐在那裏靜聽你們這些撈什子。這些是事實，是鐵一般的事實，離開這些事實，而高唱「教育爲百年大計」的理論，卅張維持原狀，這不是自欺欺人，便是別有用心。

其次，是對於中學的處理。中學這階段，是過渡的階段，但爲着要養成更多的幹部，來配合目前的民族解放戰爭，我們便不能僅僅這樣了解就算了結了，對中學教育的任務，我們還應進一步，認定中學在某種教育活動之下，可能地養成多數的爲民族解放戰爭而努力的幹部。基於這個認識，我們主張提高中學的政治教育，並按照戰時的需要，來改革中學的整個課程。同時，基於上述兩個原則，更希望中學教育在數量上在性質上都有一個改革。

再其次，是對於小學的處理。小學原來應該是國民義務教育，但在過去，我們仍舊有着廣大的兒童，被摒除在這個國民義務教育的圈子外邊。目前，我們並不主張停辦小學教育，恰恰相反，我們要求今日的小學教育的主要任務，是在怎樣把那些失學兒童都

能享有他們的受教育權；同時，基於上述兩個原則，更希望小學教育在性質上有一個改革。

再其次，是對於職業教育的處理。過去職業教育的最大缺點，就是把它與現實社會打成兩段；學校造就的人才，現實社會並不能夠充分運用，並且有許多人才，由於學校教育過程把學與用，知與行分離起來，根本就沒有用處。在持久抗戰中，由於海口的封鎖與戰事上迫切的需要，一切有助於抗戰的工業生產與農業生產的大規模或小規模的經營，都有着相當的前途；因此，職業教育便應當朝着這個方向充分地發展下去，以支持久的抗戰。

最後，便是對於民衆教育的處理。民衆教育最主要的部門，是農民教育與工人教育；這是戰時教育中最主要的對象，我們要動員全國民衆積極支持抗戰，首先就得動員全國教育工作者積極參加民衆教育的工作。在抗戰這一總目標之下，全國教育工作者應該擔負起新啓蒙運動的重大任務，起碼的工作，至少應該是提高並強調民衆的政治教育科學教學與文字教育。關於這點，作者在戰時教育旬刊有一篇要從戰時教育中樹立起新文化的基礎，說得頗爲詳盡，這裏用不着贅述。但主要的，我們必得強調民衆教育在戰時教育中的重要性。

對上述這些道理，我們還得重複述一遍的，就是要在集體主義的自我教育這一原則

之下來處理這些問題，這即是說有學校設備的固然是我們的教育場所，就是那沒有學校設備的一切集體生活也一樣是我們的教育場所，定要一座洋樓式的民衆教育館才來談民衆教育，這簡直是夢想。我們不要忘記，在戰時，一切活動，一切事物，都是我們教育的園地與資料。並且，沒有這一原則，作我們教育的骨幹，就是齊集許多專家對這些處理作更詳細的規劃，到頭來，也只落得一場空。最後還讓我說幾句，以作本文的

結尾

第一，全國教育工作者應站立在自己的崗位上，集中自己一切力量，支持抗戰到底，並擔負起新啓蒙運動的重大任務。

第二，戰爭燬滅了文化，但同時也創造了文化，在民族解放戰爭中更有着這樣的前途，我們正不必緬懷舊的一切，打從今天起，我們應從全民族的新的生活中，從新啓蒙運動的工作中，樹立起新文化的基礎。

第三，全國教育工作者，應當從集體主義的自我教育中，體煉出新的教育經驗，建立起新的教育理論，我們的主要任務，不但是用自己的力量支持抗戰到底，並且進一步要替教育與文化的領域創造出一個嶄新的局面。

第四，在民族解放戰爭的巨流中，每個教育工作者都應過着克苦耐勞的生活。在過

去正常工作中，生活所需，有着恆定的收入；一旦轉變為戰時，收入減少，自不免於感到多少的苦痛。但我們不應忘記，在火線上正有着千千萬萬為民族爭生存而流血而拚命的將士，我們多少感到一點苦痛，又算得什麼。小市民的生活方式，應該溶化在偉大而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的洪爐中。至於一向待遇最薄的小學教師，則為着增強他們工作的力量，却必得予以相當的生活改善。

第五，關於失業教師的問題，一方面固然靠政府來解決，一方面也靠自己在工作中來解決。一向錯誤的見解，都只把教育的對象，局限於學校一個部門，千千萬萬的勞苦大眾又何曾享有過受教育權，又何曾被當作是教育的對象。我們應該打從今天起，把教育對象的視野展開到千千萬萬的勞苦大眾方面去，同時，就從這些工作中運用各色各樣的社團關係，以解決自己最低限度的生活問題，至於說：為着維持失業教師的生計，主張把學校維持原狀，這就等於說：為着維持失業舞女的生計，主張跳舞廳復業，同是一樣滑稽。全民族的統一的抗戰有一個原則，就是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朋友們，現在正是我們出力的時候啊！

以上是作者對戰時教育問題的大概意見 此外如難民教育問題等等，還沒有談到，即上述的意見，也不够詳細，留到以後有機會時再來談吧！

關於宣傳工作的建議

我們根據抗戰需要，旁察各地實情，願向最高統帥部，提一緊急建議：

組織民衆的前提，是組織工作者，尤其要把做宣傳工作者，先組織起來。蔣委員長國慶前夜的廣播演講，說得何等明瞭，何等深切！他決不輕視這戰事，他主張應決心擔負更大的痛苦，並以為戰事決不是短期。那麼後方工作的全力推動，自然是刻不容緩了。我們單講宣傳工作。現在需要上千上萬的人，到戰地，到各省，更熱烈的，更普遍的，喚起民衆。同時也確有上千上萬的文化人，願做此種工作。但迄今為止，各省市都還沒有良好的組織，以致許多工作，還未能確實推動。這不但可惜，並且可危。現在的問題，不是各省市不要做，也不是思想上或人事上還有摩擦，問題是沒有從高處大處組織起來。現在後方都會，都是人覓工作，同時也工作覓人。就以武漢說，各方面的文化界人士集中得非常多，黨政當局，也整天忙着要推動，但是一切工作，還只在萌芽。武漢如此，他地更可知了。我們鑒於此種情形，願請求最高統帥部，考慮下述方案，是否可行。

第一、最高統帥部，指定武漢為全國後方宣傳工作之中心。按現時宣傳中樞在首都，但

現時並不便利。而全國工作，必須由一個中樞機關推動，此機關當然直接隸於最高統帥部，而其地點則武漢最宜。

第二、請中央宣傳部部長，及最高統帥部內職司宣傳之領袖人員，同來武漢主持，至少亦來一人。按中宣部本為最高機關，又最高統帥部，聞亦有宣傳組織，因制度未公布，故不詳。我們以為關於國際宣傳仍可以京滬為中心，至後方宣傳，則自宜來武漢主持，至少來一人，代表中樞，實際主持一切。

第三、此中樞機關，或新定名稱，或即用最高統帥部內之固有名稱。部長之下，設設計委員會，更分設著作演講藝術數部。將全國文化界願做及能做此項工作者，整個組織起來。

第四、凡後方各省宣傳工作，皆由此機關直接指導，凡準備材料訓練及遣派人員等皆屬之。而對於各省市公私自辦之宣傳工作，亦概由此機關派人會同進行，同時各省市當局對於該機關工作有必須儘力補助之職責。

第五、此中樞機關之費用，最高統帥部自任，惟在各省實行推動工作，可令各省補助。凡專屬之工作人員，皆保障其生活，其自願辭薪者許之。

第六、在武漢，應有各項短期訓練之組織，招致青年，加以必要之訓練，短期畢業，分派各地工作。

我們的簡單概念如此。我們何以這樣主張？（一）宣傳工作甚需要，但亦不能潦草散漫的去辦。必須整個組織，整個推動。（二）戰時一切以最高統帥部之意志為意志，故必須由統帥部直接指揮。（三）有此大規模的鞏固組織之後，則不論戰事過程怎樣變遷，後方宣傳工作，永不至停頓或無力。（四）現時趁武漢集中人材甚多，其地又最適中，當然應以武漢為中心，趕緊推動。（五）各省市應辦之事太多，宣傳一部份，歸中樞直接整個推動，於各省市亦極便利。

我們請求統帥部考慮一下，如以為可行，便須從速為之。總之，中國無窮的力量，歸根結底，是在我們民衆自身！舉例說，廣西何以能多出壯丁，他省何以不如，這當然是過去工作多與工作少之分。今後隨着抗戰延長，不但要無量的兵員，並且要加緊的生產。一切民衆教育訓練，都必須趁抗戰進行中完成起來，而第一步就是宣傳。這個工作又重大，又緊急，需要多少深思大慮的著作！多少熱烈的辯士！多少有能的演員！所以要動員組織全體民衆，必須先動員組織上千上萬的民衆教師！兩月以來，無人不注意後方工作，但始終還未得要領。我們於焦灼期中，建議如右。祝禱最高統帥部，不久有代表來漢，領導我們武漢文化界大眾，快快的能為祖國為抗戰而努力！

（大公報）

怎樣動員我們戰時的文化

一

抗日戰爭，已經發動兩個多月了。在軍事上已經展開了一個廣大的全面的戰線，將近二百萬的戰士，已經英勇的執行其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的歷史使命，這是世界史上一個偉大的變革時代，也是我們民族史上一個劃時期的時代。

但是由於這一個歷史的變局之來臨，我們政治的動員，較之軍事還不免是落後的，以致抗敵戰爭已發生半個半年的現在，政治的機構，還不能疾速地適應於軍事之發展，因而在文化上，一直到現在，也不能展開一個相應於軍事步調之文化戰線。

我們知道，要保證抗戰的勝利，是需要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以至文化的全陣容之合拍的推進，然後我們抗戰的力量才能成爲一種有基礎的、有泉源的、永遠不致枯竭的力量，若是僅僅注重軍事的力量，而忽視甚而無視政治與文化的力量，則這樣的發展，便會犯着軍事冒險的危險，我們最高的領袖蔣委員長所說的「弱國」對強國的抗戰，是不能以軍事冒險取得最後的勝利的。這就是說，在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戰爭中，是不

能僅僅憑借軍事的武裝而是要憑藉廣大的人力與物力，使之全體的動員，關於物力的動員應如何發動，不在本文討論之列，關於人力的動員，便不但要大衆組織化，而且要集體的給大衆以精神的武裝，換言之，即不僅依賴銳利的武器，而是要使運用這些武器的人民大衆都具有最堅決的抗戰的技能與意識，爲要達到這一教育大衆的任務，抗戰的文化化的總動員，便成爲目前的必要，從而文化動員在抗戰中，是奪取勝利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爲了支持我們抗戰的持久性並保證我們抗戰的勝利，我們應該時時防止陷入這種的危險，我們應該切實地改正並逃去這種危險。改正或逃去這種危險的方法，便是把我們政治的機構，在民主主義的原則上，依照軍事進展的步調，加以再編製，確立民主主義在戰時的體制，並進而在這種政治的基礎上，動員我們的文化，展開我們戰時的文化新陣容。

二

誰都知道，日本帝國主義不僅僅在奪取作爲我們民族生存條件的物質地盤，同時，也在企圖澈底地消滅作爲我們民族解放心靈的文化——正確的說來，在毀滅非侵略主義的人類文化。所以跟隨在那些強暴的日本法西斯軍閥軍事屠殺的後面，同時又湧來了一

批一批的日本法西斯主義所御用的文化浪人隊，在大砲飛機的掩護下，宣揚他們吃人的「王道文化」，對我們施行殘酷的文化的大屠殺，那不僅在企圖根絕中華民族的生存，而且在根絕數十年艱難締造的中國文化的遺留。

從「一九一八」以後，所謂「王道文化」的毒氛，就彌漫了我們的東三省——並且在我們全國，差不多都已有這種毒素的散佈。他們組織許多文化別動隊，深入到我們的都市和農村，利用一切的報紙雜誌，在中國的各種社會層，盡量地利用一些文化的奴才，往復又去擴大奴化我們的文化運動。他們改編我們中小學的教科書，從最根本的地方作根絕中國青年對於國家和民族復興的意識。他們企圖文化去毒死中國人民的心靈，使中國人民像死人一樣貼伏在他們那些強盜的脚下。因此有人說：這種帝國主義的文化屠殺，便能亡我民族的說法，却不是過分的。

遠在蘆溝橋事變之前，日本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先鋒隊不但就侵入了我們的華北，而且隨着其侵略勢力所達到的區域，也都留下了一個陰影。他們首先就取締作爲我們現階段革命最高原則的三民主義，以至其他革命理論的宣傳，禁止中國國民黨以至其他革命團體及革命份子個人，在華北的活動，及一切國恥紀念日之舉行，與現代國民應有的民主主義諸權利的享受——在相反的方面，他們普遍地傳播各種奴隸文化，製造並宣揚各種漢奸理論，積極地煽動中國人民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去執行敵人危害其祖國的各种陰

謀毒計的企圖，使中國民族的內部自己分化，去實現其「以華制華」的迷夢。

在最近一兩月來牠更毫無人性地焚燒我們的天津、北平，轟炸我們的上海、南京、廣州、南昌以及沿海沿江一帶的文化機關，殘殺我大學的教授、青年學生，以及他們認為有抗日意識或表現的著作家、新聞記者、雜誌的編輯人，以及一切與文化有關係的中國人民，同時並給予一切愛護人類文化的「中國的友人」以種種的危害。企圖以暴力給予中國文化以拔根地剷除，在中國領土內重建其侵略主義的文化。

隨着日本法西斯侵略主義的毒燄在中國的進展，中國的文化，仍然繼續地在遭受摧毀。由此可以看出法西斯日本文化侵略——正確的說來，法西斯主義在其本質上，便是人類文化的劊子手——不但與其軍事侵略並駕前進，而且往往先行於其軍事侵略而作為其先鋒。日本帝國主義並不絲毫輕視文化在戰時的效能，並且把文化的機構緊密地結合於軍事的機構，一方面以軍事推進其文化的屠殺另一方面又企圖以文化的屠殺去保證其侵略主義的強盜的勝利。由於物質與文化之統一的運用，才得以構成日本侵略主義之有機的內容。

三

在中國，一兩月來的事實，我們深切地感到，在這一次的抗戰過程中，我們的當局

，對於文化在戰時的作用，至少還沒有注意到，我們不必諱言，在過去，在東四省淪亡以後，平、津失陷以前這一個長期間中，作為我們的文化運動之領導的中央各機關，對文化政策，完全偏重於盲目的、消極的守範政策，而沒有何種較積極扶植的計劃，以致平、津和上海一帶所生長出來的抗戰文化的嫩芽，不但沒有得到政府的灌溉而使之成長，反而在干涉政策，檢查制度之下，遭受了相對性的打擊，這點殘餘的抗戰文化的嫩芽，現在又遭到日本帝國主義強盜所施行的拔根剷除的毒辣手段——自然却又造出了這種民族的新文化之發育成長的許多有利的客觀條件。

平、津失陷以後，曾經長期的作為我們民族文化中心的北平，以及文化中心地的文化基礎，已經被日本帝國主義的大炮打得粉碎，雖然在文化移動的形勢下，各地的文化團體與機關，紛紛成立，但那並不能完全符合現實的需要，並不能作為大眾的抗戰文化的發展地盤，仍不是我們少數同胞的玩弄；另一方面，抗戰的大眾的文化運動，仍不免受着相對的無理的限制。例如我們的政府和人民再二往復說過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等起碼的民主主義諸權利，至少對我們文化界在目前還是一個看得吃不得的「畫餅」。我們並不否認在抗戰期間文化運動應該統一領導與統一組織，但我們以為統一領導的意義，是領導文化向於抗戰的同一目標而使之集體化，並不是不允許文化在統一抗戰的目標之下，自動地發展。統一組織的意義，是把各地的各種性質的文化團體聯合起來而

使之集體化，使一同成爲創造新的民族文化的構成份子，並不是除開那些看得最熟，聽得最慣的文化組合機關之外，便不能再有其他的抗敵的文化團體之組織。現在，已經是我們民族最後鬥爭的一個機會，而且我們的政府已經在領導這一個最後的鬥爭，我們最高領袖，並已表現着最大決心在領導着這最後的鬥爭。那麼所有的文化界人士，除非是甘願作亡國奴的漢奸，誰不願意盡力去協助政府和軍隊作戰，竭誠地去：護最高領袖的抗敵主張呢？不談統一領導與統一組織，領導與組織自然會統一。如果在前線戰士浴血苦鬥的現在，我們後方的文化運動，還表現着十足的落後性，這從表面上看，似乎是文化工作者放棄責任，事實上，文化工作者，却又自有一種「啞子吃黃蓮」自己知道的苦衷。

爲了保證抗戰的勝利，我們有把文化重新再編製的必要，現在的文化領導機關，是否能夠符合戰時的要求而「勝任愉快」，是否有把願意參加救亡運動的廣大的文化人動員起來的這一計劃，這在我們，實還沒有知道。我們所知道的，是各地文化團體，還在許多年的冬眠狀態之下，沒有蘇醒過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就無理由可以禁止那些先覺的人們不發出文化動員的呼聲，我們更無理由不去鼓勵並扶助他們，使他們能夠像過去國民革命時代一樣，蓬蓬勃勃的發展起來。我們誠懇地希望我們文化的領導機關，能夠檢查過去的錯誤，認識當前的責任，而能負起這個非常時期的文化領導任務。

雖然我們對於過去的事情，再沒有算回舊帳的必要，但是爲指明將來，却不能不清查過去。本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的基礎上，外的矛盾與內的矛盾諸關係的構成，已足夠複雜的。從「九一八」以後，隨着民族的危亡局勢之顯明地到來，存在於法西斯日本的侵略和中華民族的要求生存之相互的矛盾，已經演着主導的作用，這超越了其他一切矛盾諸關係，而構成了中國民族內部統一的基礎。在這種基礎上，抗戰的、作爲全民族的新文化，應該能取得每個不願作亡國奴的中華民族兒女的同意，應該能蓬勃地成長起來的。但是事實上，因爲我們是一個弱國，因爲我們抗敵需要相當的準備，反而構成一種新的政治的矛盾。以致對抗戰的民族的新文化運動，反採取干涉政策，——現在已經不是這樣。這也許是我們感覺力的遲鈍，也許是當局的苦心，也許是我們眼光的近視，然而「往者已矣，來者可諫。」

在那種新的政治矛盾的基礎上，以致內在諸矛盾反而未能即行和緩下來，從而仍表現爲各黨各派的政治見解之紛歧。在其間，雖然都有抗日的共同要求，但緣各自拘泥於政治經濟上之近視性的利害，以致不曾立即產生全國統一的局面，從而不能表現出一個文化的統一的動向。我們所謂新的文化動向的內容，不是某單一團體或某些少數人的文化，而是全民族的文化；不是舊有的或外來的文化的抄襲，而是在一切人類文化的基礎上的一種新的文化的創造。那不管是民族自己的舊有的文化或外來的文化，只要是抗敵

的民族新文化；有用的東西，都將一一的被吸取；反之，便毫無容赦地都要給以排除的。

四

現在全面抗戰，業已開始，在軍事上我們已經動員了廣大的武力，在文化方面，雖然也漸漸生長出許多抗戰的民族的新文化的組織，但是談到文化之全面的總動員，還是相差甚遠。因此，我們感覺對於文化，有在抗戰意識上重新加以編製，擴大固結與充實的必要。

第一、要使我們的文化大眾化；正確地說來，文化本來就是屬於大眾的，牠就是大眾的現實的物質生活的反映。不過，後來因為一部分人擁有對於物質的統治，因而也就擁有對於文化的統治。所以文化在歷史上的諸時代中，都往往作為一部分權力者的意識表現出來。不過，我們這一次的抗戰的性質，既不是依於資本家的意識所表現的侵略戰爭，也不是依於封建軍閥的意識所表現的地方的內戰，這即是說，不是依於某一部分人或某一地域人的私的要求而表現的戰爭，而是依據於我們全民族四萬萬七千萬人之一致的共同的要求所表現的殖民地的解放運動的戰爭。像這樣性質的戰爭，如果要取得勝利，唯一地，只有使全民族四萬萬七千萬人，不分性別，不分等級，不分種族地都把他們

的力量表現出來。因此對於我們全民族廣大的人民大眾的抗戰熱情之喚起，使他們從各方面直接間接地去參加我們的抗戰，在目前是一個急務。爲了要現實這一個急務，首先就必須把文化歸還於大眾，即是把文化大眾化。所謂文化的大眾化，即是：在質的方面，放低文化的水準，加深文化的內容；在民主主義的原則上把抗戰的意義，廣播於一般人民大眾，使他們之中的每一個，都能澈底地了解這一次戰爭的神聖的內容，和偉大的意義，這一次戰爭與他們自身的密切關係，以及在這一次戰爭中，他們每一個人所應負的任務，而自發地自願地負起世界史所給與他們的一個偉大的歷史使命。在量的方面，便是去擴大文化的對象——從學生普及到農民與工人——和文化的領域——從都市伸展到田野和工廠。我們必須要使民族中的每一個人都要接受文化的機會，要使全國的每一個地域都有文化機關的設置。這樣，我們的文化，便會從少數人玩弄聰明的東西變爲啓發大眾的戰鬥意識的工具，反之，在大眾的戰鬥意識的燃燒之中，又必然地會鍛鍊出一種文化之新的內容。

第二、要使我們的文化集體化：這就是說把以前在散漫的、不相聯系的狀態之下的各種文化團體，嚴密地組織起來，去構成一個文化的有機體。每一個文化團體或文化人都成爲這個有機體的一個細胞而緊密地結合於這個有機體之內，形成一個生動的系體的文化機構。這里所謂組織，當然不是站在某一單一團體、黨派或個人的私的利益之上，

而是站在全民族解放的整個利益之上，把一切紛歧的見解統一起來，使之形成一個偉大的堅實的集體的文化陣綫。集中文化的力量，擴大文化的隊伍，統一文化的目標，整齊文化的步伐，去集體地創造並發揮我們文化的威力。這里所謂系統，也當然不是某一部分人的刻版式的系統，而是仕民主主義的原則上，依照文化團體的性質或文化個人的技能，促成其自覺地自動地向於集體化發展，如社會科學的集團，自然科學的集團，這些集團又再相互結合為一個全體，在中央組成一個文化的最高司令部，在各地，也同時組成文化的指導機關。這樣我們便可完成我們民族文化在戰時之有機的構成，以適應於軍事與政治的步調，現在客觀的條件，已經促成了我們文化集體化運動之萌芽，比如各地之文化界抗敵後援會之先後成立，各地教育界之救亡運動的興起，這自然是一個有利於我們抗戰的現象。因此，我們目前的任務，便是要以全力加速這種集體化運動的萌芽之發育滋長，使之成熟。我們不僅在後方，組織文化宣傳隊，在前線，也要組織文化突進隊，在國外，組織文化遠征隊，甚至在敵人的勢力範圍內，也要組織文化游擊隊。我們不僅要有橫的組織，而且還要有縱的組織，如國際政治經濟研究隊，軍事普通常識宣傳隊，戲劇隊，……等。一切的文化團體和文化人，都集體地去教育並鼓勵人民大眾之抗戰的精神。

第三、要使我們的文化現實化：文化本來就不是一種空洞的虛立的東西，而是某一

定民族的社會的政治經濟的構成之反映，換言之，即是某一定民族的現實的物質生活之反映，所以只要某一定的民族的現實的物質生活有了變革，也就變革了這一民族的文化。我們民族在以前的政治經濟的構成，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因而所表現的文化，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文化，現在戰爭已經開始改變我們的政治的經濟的原來的構成，而走上民族自由平等的解放的歷史路程，因此，我們的文化，客觀地必然要隨着我們的社會的變質而變質，即必然從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文化而轉向民族解放的文化。所以我們可以說，文化的自身就具有一種現實性，而且文化在現階段的中國之現實，就是完成他本身的一個革命的飛躍，因此，我們以為在全面抗戰的今日，對於文化，我們必須剷除一切虛偽的粉飾，經院的空談，應該樸素地把文化去應用於現實的方面，不但暴露現實，而且進而改變現實，使文化不致成爲一種空虛的呻吟，有閒的玩弄，而成爲作爲現實的諸事實之具體的表現的工具。比如在消極方面，隨時分析國際政治的傾向，暴露敵人的社會的矛盾，以及對中國所施行的一切無人性的野蠻的事實；在積極方面，宣傳防空防毒以及一切戰時人民所應具備的普通常識，鼓勵後方人民之生產……等等。總之，把文化從空洞的玩弄轉變爲與實際生活——尤其是戰時的人民生活——密切攸關的東西。

第四、要使我們的文化積極化：一個戰爭的勝利，不僅需要前線的物質力量之鬥爭

，尤其需要一般人民的抗戰情緒之高漲。要使人民的抗戰情緒之高漲，對於激發人民之民族意識是必要的。同時把我們民族目前之悲慘的遭過去坦白地告訴人民尤其是必要的。尤其要告訴人民，這一次的戰爭不是像從前一樣為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戰爭，而是為全民族每一個人的生存而戰爭，而且除了抗戰以外，便沒有得生存的可能。因此我們在文化上，我們必須消除一切假裝的中庸，以及一切畏縮的、懷疑的、妥協的、保守的後退主義，我們必須在解放鬥爭的原則上重新建立一種戰鬥性的、積極性的民主主義的文化。剷除封建主義文化中之一切腐敗的、消極的因素和一切殖民地的奴性文化，我們要以文化的積極性，去提高我們民族的鬥爭精神，去加強我們抗戰的意識。我們再不能要人民在這樣民族危亡期中，不發出神聖的呼籲，我們要把人們從睡夢之中喚起，在我們最高領袖的領導之下，一批一批的走上抗敵前線，把每一個人的血管中去充滿了抗戰的因素，因而我們覺得從今以從，我們的政府，應該取消文化的干涉主義甚至限制主義，盡量讓我們的文化走上積極的、戰鬥的新階段。盡量讓我們的文化在戰爭中，發出驚人的怒吼，盡量地讓我們的文化去和殘暴的法西斯主義的文化英勇地肉搏，在東方放出正義與人道的光芒，寫出我們民族解放戰爭的光榮的歷史。

五

以上四點，實際上就是文化動員這一個問題的多方面。這四點決不能孤立的進行，而必須把他們在民族解放鬥爭的意義之上緊密地互相聯系起來全面地推進，才能達到文化動員的目的，也才能實現文化動員的任務。

現在，大多的人們，對於這一次抗戰的意義，還不甚理解，這種情形，在許多方面——尤其是漢奸之蠢起——表現出來。這都是由於缺乏民族意識的原故，因而，也就是我們的文化沒有負起牠的戰時的任務的原故。所以在現在去發動我們民族文化的總動員，是再不能，而且也不應絲毫遲疑的事情。

(翦伯贊)

抗戰中的思想問題

全面抗戰中所包括的方面是很多的，思想的抗戰便是其中的一面，而且是極重要的一面。

可是到現在為止，這一面和政治，外交諸方面一樣，也是比較得落後於軍事的抗戰的。思想是行動的指導，抗戰的行動不但必須所抗戰的思想與之相適應，而且思想必須站在行動前面去指導行動。現在，隨着我們的抗戰行動的不斷進展，我們對政治，軍事上的姦賊——漢奸，間諜和妥協分子，苟安分子們——的鬥爭，也一天天地加強起來了，但是我們對於思想上的姦賊，對於漢奸准漢奸的思想，妥協，瓦全，悲觀，失敗的思想，以及對於一切足以阻礙全面抗戰之最後勝利的思想或主張，——却並沒有隨着抗戰的展開而進行有系統的，堅強的鬥爭。因此，各種有害於我們民族陣線之鬥爭前途的思想和觀點，直到現在依然隨時隨地的在那裏蠢動：在各種跟抗戰和一般政治有關的具體問題上，在那裏或明或暗地露出馬腳來。這在需要對強敵進行抗戰到底的現在，是何等嚴重的一種現象啊。

因此，思想上的鋤奸運動，爭取思想上的統一禦侮的運動，在目前實在非常需要，

而且它和我們的武力抗戰一樣地需要長期持續，不屈不撓。

在這篇短文中，作者想就自己在言論界中所看到聽到的關於現實政治問題的各種有害的見解或主張，指出其方法論上的根源，並予以嚴正的（即根據科學方法論的）批判。不過可以批判的觀點當然很多，我這裏却祇能擇其綦綦大者。

首先要說到的一種極流行的思想方法病，便是形而上的毛病。大家知道，形而上的思想方法底主要特點有二：靜的觀點和孤立的，隔離的或偏面的觀點。它跟辯證法的動的觀點，相互聯繫的觀點和全面整個的觀點，恰巧是完全相反的。

在「八一三」以前，許多的恐日病患者都持那樣的見解：說我們是弱國，我們談不到打倒別人，祇能犧牲自己；無論怎樣弱法，犧牲自己總做得到的。自然，「我們是弱國」這一自我估計，在某種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它並不是絕對地正確。爲什麼？因爲在技術經濟的發展水準上，特別是在軍備程度上，我們跟強敵比較，確實顯得是弱國了。但是這僅是偏面的估計：在另一方面，我們却有比敵人強的地方。首先是我們全國上下，不論政府或民衆，不論富貴或貧窮，也不論甲黨或乙派，都空前地團結一致，形成了政治上的銅牆鐵壁，足以抵擋敵人槍炮的進攻。我們的對敵抗戰，是有四萬萬民衆之積極的堅決的支持的。這一種偉大的全民團結，堅強無畏的民族陣線，是敵人所絕對缺乏的。表面上日本國內，在軍部的高壓控制之下，也好像是「一致對外」的，但實際

上因爲日本軍閥的侵略中國，是藉犧牲日本民衆的利益，甚至犧牲一部分資產階級的利益來進行的，所以大多數和平民衆根本反對戰爭。這種反戰情緒，縱有軍部施以高壓，最近兩個月來始終在不斷地高漲起來，因而敵國內部的種種矛盾，便不斷地尖銳起來。此外，在敵人鐵蹄下過了幾十年奴隸生活的高麗，台灣等等民族的反日運動也在勃興起來。這樣，在內部的政治關係上，我們現在的確比敵人強得多，怎麼能一般地說「我們是弱國」呢？

恐日病者祇拿軍備技術的水準去判斷強弱，難怪要得出失敗主義，悲觀主義的結論來了。這種「唯武器論」的主要的方法論：根源便是形而上的孤立觀或偏面觀：它把軍備技術孤立起來觀察而拋棄了軍備條件跟其他條件的聯繫：它沒有全面地觀察事情。

自從抗戰勝利的消息不斷地鑽入人們的耳鼓之後，唯武器的恐日病，彷彿像瘟疫遇到寒秋一般地斂跡起來了。可是接着却發生了一種表面上跟恐日病相反的新病：這種新病，錢俊瑞先生稱它爲「唯軍事論的虛驕病」，我認爲是很適當的。假如過去的唯武器論的本質是恐日病，那末現在的唯軍事論的本質却是輕敵病了。在前線打了幾次局部的勝仗，或者是擊退了幾次敵人的進攻，於是就有人以爲敵人是「不值一擊的」，我們有着這樣強大的勇敢善戰的軍隊，儘够可以打退敵人了；他們以爲單憑我們軍隊的抗戰，就可以制勝；根本把民衆的政治總動員，把武裝民衆發動廣大的游擊戰，把加強抗戰的政治機

構，把實施革命的抗戰外交等等任務，都完全忽視了，那樣，口裏儘管喊「全面抗戰，」事實上却祇是「一面抗戰」(祇軍事的)。這顯然是形而上的片面觀在那裏作怪。

輕敵的唯軍事論和恐日的唯武器論，表面上雖完全相反，二者的病源却完全一樣：形而上的片面觀或隔離觀輕敵的唯軍事論者，也一樣地沒有注意到軍事跟政治，外交，民衆等等諸方面的密切聯繫，沒有真確地認識全面抗戰，他們根本缺乏全面的或整個的觀點，而只知形而上地拘泥於一面。

同時，唯軍事論和唯武器論，還有另一個共同的思想病源，便是定命論；前者認為我們民族的命運，唯一地決定於軍事；後者則認為我們的命運決定於武器。顯然，這種定命論(一切定命論的方法都是形而上的)是完全反科學的思想。在實踐上，它直接或間接地阻礙着我們的最後勝利之實現。

現在我們再回過來考察「我們是弱國」這一自我估計的真實性問題。假如像悲觀的失敗主義者所設想，以為我們是弱國，所以我們只能犧牲自己。就算我們現在整個兒地是弱國，難道我們因此就一輩子不會變成強國了嗎？這顯然是自暴自棄的觀點。這又是形而上的另一特徵——靜的觀點的產物。事實上，國家民族的強或弱，是完全隨我們之努力奮鬥與否而變動的。我們目前對敵抗戰，便是我們自強不息的表現。難道弱國是生成一輩子做弱國的嗎？

第二種流行的思想病，是機械論病。

機械論的特徵之一，是只重內容，不重形式；只見現象，不見本質；只知有量，不知有質；實際上是拿前者，來代替後者。

譬如有人主張在抗戰發動之後，我們須少作政治的號召，而應當多多作具體的建議。也有人主張，在這民族解放的實踐時期，我們不需要理論而只要拿出具體的辦法來，拿出應付具體事實的實際辦法來。這些先生們把政治的號召和理論的檢討看作空洞的，無補於事的，甚至有害的！這樣，把技術的具體辦法跟政治的號召對立起來；把實踐跟理論對立起來；這種以形式（政治，理論）去遷就內容（技術，實踐）甚至拿內容去取消形式的機械論觀點，結果必然要墮入庸俗的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的陷阱中去，試問技術性的具體辦法可以脫離政治號召的方針嗎？實踐的策略可以脫離理論的指導嗎？稍具方法論常識的人，一定會給你一個否定的答覆的。而且兩個多月的抗戰經驗告訴我們，漢奸儘管殺儘管產生；極大多數的老百姓雖有仇恨敵人的心理，但總是一盤散沙，沒有給軍隊以應有的幫助，很多地方的老百姓，把抽調壯丁，訓練壯丁看作「拉夫」一樣地害怕；這些事實都說明目前廣大的政治號召不但不應減少，且應大大地加強擴大。假如以為消滅漢奸和組織民衆，使老百姓不但怕「拉夫」而且個個自願地為抗戰服務，只要靠具體的技術上的辦法就能達到，那就無異把消滅漢奸和組織民衆看成單純的技

術問題，而不是嚴重的政治問題了。要是這種機械的，庸俗的實用主義支配着我們每一個人的意識的話，那末全面抗戰的前途至少是很黯淡的了？重實踐而輕理論的毒害，亦與此同。

另外一種機械病的具體表現是重現象而忽本質，事實上是拿本質去等同於現象，也就是拿現象去取消了本質。譬如關於和平的問題，苟安派，瓦全主義者所要求的和平，跟真正適合中華民族利益的和平，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在苟安派的心目中，假如敵人能答應將蘆溝橋事變後增派到中國來的軍隊完全撤去，表面上保持華北五省的領土主權完整，一切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態，那就是值得萬分慶幸的事（也許打個大折扣，苟安派也很願意的。）這一來，中日的和平（假如中國四萬五千萬人願是這種敗類的話，）自然立即實現。但是現在的中國絕對大多數人所要求的和平，却是：經過長期持久的全面抗戰，以達到恢復「九一八」以前的狀態，並實現中國之澈底的自由平等條件之下的真正的永久和平。顯然的，這樣的和平和瓦全式的和平，從表面現象上看去是一樣的，但本質上却是南轅而北轍。前者是在暴日鐵蹄下做奴隸的「和平」，後者才是平等，自由，相敬，相愛的真正和平。反過來說，表面上不和平的舉動，本質上倒可能具有真實的和平意義的。例如我們的抗戰，本身就是維護世界和平正義的。例如將來全世界酷愛和平的國家聯合起來武力制裁侵略國，那也是種表面不和平而本質上和平的舉動。

還有一個重現象而忽視本質的例子，也值得提出來說一說。向來有（現在依然有）許多人談到外蒙問題時，總把外蒙跟偽滿同樣看待，彷彿偽滿既是日本的傀儡，那末外蒙便是蘇聯的傀儡——日本帝國主義者和一切在反赤旗幟之下助桀為虐的人們，無時不在努力做這樣的宣傳；他們正要想藉此以分裂我們五大民族的統一陣線；他們，尤其是日寇，正想藉此以辯護「滿洲國」的合法，藉此作為侵略中國，進攻蘇聯的護符。我們知道，事實上外蒙古共和國和偽滿外表上彷彿相同，本質上簡直完全相反的。我們平心靜氣地講，根據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大中華五大民族，本質平等的原則上，它們本有各自治理之權，那一個也不能強制地統治別一個。五族共和原是依據自由聯和之原則而實現的。而外蒙古則向來在承認中國宗主權的條件之下獨自成立自治共和國。我國既承認它的自治，它在侵略者不斷威脅之下，當然有與利害相同的鄰邦實行親善合作的權利。但是因為在蘇蒙關係中，蘇聯是世界上的一大強國，而蒙古却是一個荒涼的落後國家，所以事實上的前者領導後者，確是無可諱言的。這樣便形成了外蒙和偽滿表面上的等同。但是本質上兩者不但不一樣，而且完全相反：外蒙是獨立的自由的，跟蘇聯處於平等互助的關係中；偽滿却是日本帝國主義一手包辦成功的傀儡把戲，事實上完全變成了日本的殖民地，這是有目共睹的。其次，外蒙是反侵略的，偽滿却是侵略者的爪牙；外蒙不但形式上承認中國的宗主權，而且在維護和平反對侵略的鬥爭中，它必然跟中國站在一條

陣線積極擁護我國抗戰的；「滿洲國」則已公然派軍隊和暴日一致來進攻我國了。

此外，如等待主義，「左」傾幼稚病，英雄主義，主觀主義等等思想病，我們也隨時隨地可以發見；它們都有一定的哲學基礎的。但因作者時間有限，本刊篇幅亦有限，只好留待將來有機會時再來討論了。

（沈志遠）

抗戰教育的任務

現在，對日全面抗戰已經愈益展開。這個偉大的神聖的反侵略戰爭，無論就國內的形勢或國際的形勢來看，對於我們都是絕對有利的。目前在軍事上我們即使不能不忍受許多必要的犧牲，甚至於失敗，可是我們的困難是以數學級數增加的，而我們在客觀方面的有利形勢，則是以幾何級數增大的。相反，日本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他們也許可以用用優越的兵力，暫時取得一些小的勝利，可是他們的勝利是一二三地加上去的，而失敗的因素，則是一，四，十六，地增長着的。在這樣的情形底下，我們暫時當然難免有許多損失，但最後的勝利終必屬於我們。任何惡勢力也不能阻止我們這個神聖抗戰的發展，更不能妨害我們的最後勝利。

但是我們在客觀方面，雖然有這樣好的趨勢；在主觀方面却仍然有許多非常嚴重的問題必須注意。我們所要支持的，乃是一個最進步的現代戰爭；所要應付的，乃是一個最險惡的國際舞台。因此我們無論在政治方面，經濟方面，軍事方面，以及一般的文化方面，都必須要有相當的基礎才行；可是我們一般民衆的文化水準，却非常落後，甚至於比日本更壞。我們全國的文盲，到今日爲止，還佔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我們大部份的

人不單對於國內外的時勢，沒有一個切實的了解，甚至於有許多落後的民衆，對於這個生死關頭的神聖抗戰還未盡了然，好像與我無關似的。至於在科學方面，情形就更壞了，不單普通人不成，就是一般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也非常缺乏技術修養。我們大部份的軍隊，不單沒有機械化，和政治教育，而且也缺乏新的戰術與戰鬥的教育，甚至於有了新的武器，一時也不能運用自如。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很明白地可以看到一個非常嚴重的現象，即我們在當前的戰鬥太艱苦，而我們的能力則太薄弱。如果我們不能克服這個弱點，那麼我們的前途就要暗淡得多，至少也要增加許多不必要的困難和犧牲；甚至於會因此失去可以得到的勝利。所以我們在當前的任務，決不只是發動抗戰支持抗戰，更主要的還要注意在抗戰的過程中，儘可能地提高我們整個民族的戰鬥力。我們要抗戰，但我們不是閉着眼睛死打，我們必須不斷地提高我們自己，充實我們自己，健全我們自己。

可是誰能夠負起這個重大的担子來呢？只有教育者！這是我們全國教育者在目前不可推諉的歷史使命。我們不幹教育就算了，要幹，就必須把全生命的力量放在這個上面，不怕一切困難，堅決地負起這個責任。

但是教育者在目前還不只有這一個任務。我們知道戰爭這個東西，通常說起來，完全是一個破壞的能手，可是就中國的抗戰來說，這話却不是很正確的。中國現在所進行

的，乃是一個爭取中華民族之澈底解放的神聖戰爭。他暫時固然要破壞我們許多文化機關，摧毀我們許多新的建設事業；可是他決不能破壞我們的文化基礎；不單不能破壞，而且還一定可以成爲我們將來的文化發展的開路者。他可以幫助我們獲得許多更深刻正確的新經驗，新教訓，新認識：（無論是自然方面社會方面。）並且隨着砲火與戰爭影響所及，還可以把這些新東西很快地普及於一切民衆和窮鄉僻壤。不過這一切新東西的產生，決不是一開始就很完整的，他是零零碎碎地反映在各種不同的場合和時間中的。正如許多石塊互相碰擊的時候一樣，這裡冒一個火星，那裡冒一個火星，如果我們不預備好引火物，隨時隨地把他引發起來，那麼這些火星永遠都是自生自滅，對於我們什麼作用也不會有了。假如我們能夠時時刻刻都注意着把他們收拾起來，保存起來，發展起來，那麼開始也許只是一些星星之火，以後就可以愈益發揚光大，開成一朵燦爛的文化之花丁。因此，我們在目前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在抗戰的過程中，隨着抗戰的進展，不斷地提煉抗戰中之新的經驗，新的教訓，新的認識，發展新的文化基礎。這個担子誰能挑呢？最主要的也只有教育者。由此可知，教育者在當前，實有兩重重大的使命：第一是提高全民的戰鬥力；第二是發展新的文化。這兩個任務是不可分的：要提高全民的戰鬥力，就必須發展新的文化；同時發展新的文化，事實上也就是全民戰鬥力的提高。這是我們教育者在當前的歷史使命。我們必須不怕一切困難負起這個責任。同時也

只有認清了這兩重任務，才能辦得好今日的教育。

近幾年來，時常聽到人說：「中國教育破產了！」我覺得這話還說得太早。要問中國教育是否破產，就要看今日。在今日，我們已開始了堅決的對日全面抗戰，這是中華民族的生死關頭，我們亡國？還是得到解放？全在此一舉。同樣，中國教育的命運也就決定在這一剎那間。我們能完成我們的使命，不單不會破產。還要成爲歷史上空前的偉績。如果不然，那不只是真正要破產，而且也要成爲全民族的大罪人，所以無論爲着民族，或是爲着教育，都必須立刻動員起來，向着這兩大任務，勇往前進；爲着完成這兩大任務，準備流盡我們的汗和血，用盡我們的生命和力！

（季平）

戰時的難民教育

難民是直接受過敵人的危害而來，他對敵人的仇恨，非常深刻，但因為大多數的難民，一向過着個人主義的無組織的生活，加上現在又失去了生產連繫，或者職業連繫，而過着流離失所的悲慘生活，以致對敵人的仇恨，只成爲一種空漠的意識。

爲使難民對敵人的仇恨，變成具體化，使流離失所的生活走上戰時的集體生活，那麼，教育的工作是非常迫切的。

難民教育的基本認識有二：

一、難民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員，新文化的基礎教育，也在實施之例，使他們從迷信愚昧的深淵中解脫出來，走上科學和民主的坦道。

二、難民教育的特殊任務，要使難民從被人救濟，走上自己救自己，從向人求救，而走上救助他人。從個人主義的生活走上集體主義的生活。從散漫的生活，走上有組織的生活。造成一個堅強的戰鬥員。

難民教育的課程

難民教育的課程，決不是上一課國語，再上一課戰時常識就算教育了難民，我以爲

課程上必須要有：1. 一般的政治知識，2. 一般的軍事知識，3. 一般的文化知識，4. 生產技術的訓練，5. 同有直接意義的抗戰生活連繫，6. 識字等。這中間，若以百分比來說，則政治知識要占百分之六十，軍事知識占百分之二十，抗戰實踐占百分之十，其餘則由其他各課程分配。

難民教育的教材

(1) 從早上到晚上所經過的日常生活，如飲食，起臥，談話，行動，是現成的好教材之一，在生活過程中，將不顧公共衛生，不守秩序的難民指出錯誤，並使他們糾正。

(2) 從難民身上，找出更具體更能反影現實生活的實際材料，加以整理，用各種方法表現出，指出他的原因結果，及將來應走的路。

(3) 將每天所發生的國內國外諸現象，比較明顯而和抗戰有關的事件，編成教材給與充分的機會去討論。

(4) 採取編好的大眾教材，選擇最適合，最經濟的一頁，給他們用。

(5) 地理，歷史，數學，氣象，藝術等教材均以適合抗戰，適合集體生活的需要為採用的原則。

難民教育的方法

一切教材的應用，課程的進行，都要採取集體的方式，從做作上教，從做上學，每

一觀念的克服，都要是集體主義的觀點，每一個最平常的生活，要指出他的個體和集體的區別，例如吃飯吧，就指出這個飯，不是那一家私自送來的，這是同胞們大家送來的，要是大家只顧自己，你們的肚皮就要空了，國也要亡了。在收容所內以多收集會方式，編隊方式等來教育。在收容所外，也可隨時隨地隨事態的狀況，施以戰時的集體主義的自衛教育。

難民教育的教師

若在難民收容所，則需要有和難民住在一起，同生活共甘苦的教師，指導他們，再用會的教不會的學底方法，去扶助指導。

另一方面可以確定外來的教師指導法。

在難民收容所外，如在路旁，在車站車中船中等的難民教育，可以確定巡迴教育法去教育。

最後談幾句，作本文的結尾，我希望每個做救濟難民工作的人員都是一位好教師，每個難民收容所，住留地都成爲最好的學校。這是要大家的努力來完成的工程。

(維持)

